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百年经验

成 龙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历史是未来的镜子,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为根本的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关系人民生活的重大关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既胸怀远大理想,又立足实际,根据国情制定切实的奋斗目标;在全局、重点和非重点之间,既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关系全局的战略策略,又关注次要矛盾的解决,做到统筹兼顾、协同发展;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既强调改革是动力之源,发展是硬道理,又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稳定也是硬道理;在各类人才和普通群众之间,既重视各类人才的带动引领作用,又发挥普通群众的探索创新精神,让各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幸福美好生活;百年经验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1.03.022

幸福美好生活既是一个主客相关性概念,也是一个时空相关性概念。立足生活世界,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点和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经历了不懈的奋斗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既胸怀远大理想,又立足实际,根据国情制定切实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是怀抱远大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理想”是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源”。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建立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没有任何生活之忧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实”是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脚踏板”。早在1919年,在“问

作者简介:成龙,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19ZDA016);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

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就曾指出“主义”和“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①。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就是既秉持“理想”又立足“现实”,为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而拼搏奋斗的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饱受饥寒、奴役和压迫。党的一大明确将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②。实现共产主义首先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幸福美好生活要从得到土地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成了革命的首要任务。得到土地的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③。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生动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豪情。“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英勇的红军能够完成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靠的正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前仆后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样靠的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高度肯定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④邓小平也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⑤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迎来了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新起点。为了让人民尽快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殚精竭虑,进行了艰辛而又卓越的接力探索。从组织互助组、创办合作社,到实行“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新道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映了全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初探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1960年代初,针对当时的困难局面,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的政策,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人民的收入得以增加、生活得以改善。1975年,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深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基本国情的认识。一方面,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把“有理想”放在首要位置;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队伍,把“革命化”放在首要位置。邓小平指出,一定要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有理想,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一再强调,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的发展目标。1979年7、8月,邓小平离开北京先后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小康之家”的概念,标准是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

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元。他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①在反复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1987年4月,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并指出“三步走”的目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公布“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不断完善,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加以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②。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在行进的道路迷失方向,遇到艰难险阻时踌躇畏缩,只有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定力,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经受得住各种考验,最终取得各项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理想信念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和人民的生活具体联系起来。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老百姓关心的具体问题抓起。比如,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等等。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将创造人民幸福生活从初级阶段推向更高的阶段。

二、在全局、重点和非重点之间,既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关系全局的战略策略,又关注次要矛盾的解决,做到统筹兼顾、协同发展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中国,幸福生活属于全体人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创造人民幸福生活,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认为“全局”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既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解决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重点问题,又要统筹兼顾,关注次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进行工作铺垫,寻找突破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工作的“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对“大局”的统一领导,与一切片面的、单纯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分裂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作斗争。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依据不同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不同的工作重点。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并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取得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创建人民军队,用革命武装打倒反革命的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也高度重视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成功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与国民党进行抗日“联合”这一大前提下,又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阶级矛盾再次转化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最终促成“双十协定”的签订。全面内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

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不仅有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正面战场的较量,更有敌后隐蔽战线的激烈争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为构建更高层次的幸福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国家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工作的“大局”。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实现“两个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工商业由萧条到复苏。到1952年下半年,土地改革的任务即将基本完成。按照“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三大改造”即将基本完成之际,1956年4月,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党的八大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与经济建设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人还扫除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干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配合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反思中国国情,再次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大局”的认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工作重心。邓小平提出了如“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两手抓”的方针。邓小平强调,在谋划现代化建设时,一定要有综合平衡的观念,“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④。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的整体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⑤。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性质、就业方式、收入分配等条件的变化,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开始变得多样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1世纪初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大局”。“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撑起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三个方面,形成一个理论体系。针对发展中出现的唯GDP、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体现了共产党人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根本要求、根本方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③《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页。

法。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不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发展的真正价值;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才能做到长久发展;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做到整体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审视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局”。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工作重点。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关系大变革,人的思想观念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由于环境和大局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对客观物质生活“硬条件”的需要,也包括对主观满足幸福感、获得感、尊严感等“软条件”的需要,尤其对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提高发展质量,调整发展结构,补足发展短板,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关系发展全局的新问题^②。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要坚持整体推进,加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衔接,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作出了全新的思考和安排,形成了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的科学体系。

三、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既强调改革是动力之源,发展是硬道理,又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稳定也是硬道理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基本经验。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为了推动发展。只有在改革和发展中,才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和发展才能持续顺利推进。

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不断革命,向前发展,扩大革命成果,又不断巩固和稳定后方,为前线提供多方面保障和支持的问题。革命本质上是用激进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迅即的根本改革。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对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创造条件。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土地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然而,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其不公,只有通过革命,才可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党的一大明确提出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④。党的二大提出要废除重税,规定城乡土地税则,并对田租率加以限制。1927年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提出“没收一切大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基本原则。1931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条土地路线的执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更加积极地参加和支持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1941年,党中央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同时,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抗日根据地掀起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②成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逻辑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页。

③《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衣食足”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扩大革命战果,另一方面又积极加强解放区的建设和发展。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由此,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效支援了前线。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改造社会、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比如,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得到占中国91.4%的耕地;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彻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合法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打击社会玩瘴痼疾,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娼、毒、赌等基本禁绝;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基本改造;等等。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寻找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①我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要破除对苏联的教条和迷信,独立自主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八大的召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怎样发展的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再次,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发起“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196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使国民经济朝着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方向运行,取得了显著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缺一不可的关系。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②。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论述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③。江泽民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其中,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④。胡锦涛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论述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方面都关涉影响其他方面,最终影响全局。只有积极推进改革,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稳定才能长久。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必须探索和把握三者的动态平衡。推进改革胆子一定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对一些重大改革,必须进行系统设计,提出总体思路和方案,推行起来要稳扎稳打,通过不断努力逐步达到目标,积小胜为大胜。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危险和挑战更加严峻,习近平同志强调,“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⑥,“必须坚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461页。

⑤《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0页。

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①,“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②。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发展和稳定辩证关系的认识。

四、在各类人才和普通群众之间,既重视各类人才的带动引领作用,又发挥普通群众的探索创新精神,让各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幸福美好生活是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人民既包括各类人才,也包括普通群众。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各类人才和普通群众都承担着使命和任务。各类人才担当着组织领导、战略制定、方案设计、科技突破等任务,而普通群众则将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划、方案直接付诸实践,根据实践的要求为新的探索提供直接的问题和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各类人才的作用,也特别强调发挥普通群众的首创精神,让各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优秀的将领人才。比如,通过与国民党合作,联合举办黄埔军校。延安时期,曾创办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十几所学校。毛泽东亲自讲授唯物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在当时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③这生动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高度重视普通群众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毛泽东认为,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中国的革命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成为打不烂的“铜墙铁壁”,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的规划。1960年代,“两弹一星”试验成功、大庆油田、“三线”钢铁基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涌现出如钱学森、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培养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以及铁人王进喜式的劳动模范,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劳动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创造活力,但在旧制度的压抑下他们没有发挥这种创造活力的机会,现在解放了,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的创造活力开始爆发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破除迷信,为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搭建合适的舞台,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⑦。

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⑧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要把教育摆在发展的优先地位。我们的事业需要一大批人才,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邓小平认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88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身份和地位高低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①。邓小平高度重视普通群众的首创精神,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②。党和群众是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党始终紧紧依靠群众、始终发挥群众的巨大伟力,始终为了群众利益,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形成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江泽民深入分析世界发展形势,认为在当今世界,创新已经成为决定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关键所在,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教育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通过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变革,营造人们干事业、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③。胡锦涛根据国内外新的发展形势,强调要“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④。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和群众探索创新精神的重要论述。“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⑤。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好现有人才作用,同时要敞开大门,招四方之才,招国际上的人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要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不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加快建立全新的人才评价体系、培育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让人才成长的土壤、氛围和环境更加优良;我们不仅要培养和引进人才,而且要选好、用好、管好人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人民群众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主体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发展和伟业离不开人民群众,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传承和光大离不开人民群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国共产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创造智慧,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使最广大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⑦。

(责任编辑:马纯红)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④《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56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3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⑦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9页。